

从洪宪帝制到

云南护国

唐靖 著

——
大事件背后的是是非非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从洪宪帝制到云南护国

——大事件背后的是是非非

唐 靖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洪宪帝制到云南护国 / 唐靖 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222-05985-6

I. 从… II. 唐… III. ①洪宪帝制②护国运动 IV. K25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4545 号

责任编辑: 马跃武

责任印制: 洪中丽

装帧设计: 美克印艺

书 名: 从洪宪帝制到云南护国

作 者: 唐 靖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7

字 数: 320 千

版 次: 2009 年 6 月 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印 刷: 昭通美克印艺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5985-6

定 价: 3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公司联系

序

快意读书

“快意读书”是人生快乐之一。比这快乐的是书籍的作者是其所熟悉的人。更快乐的是，你熟悉的这位作者居然是你曾经的学生。曾几何时，唐靖还坐在北师大文史楼三层会议室的长条几案边，与我相向而坐，与八位研习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生同窗相向而坐，大伙儿侃侃而谈，其乐融融。

一晃几年过去了，学生们天各一方，偶见书信。

再一次真切地了解唐靖，已经是摆在面前的书和记忆中他略显忧郁的神情了。

惊喜之后，就有了快意读书。

这是一部雅俗共赏的书。说它雅，是因为它尽可能严肃地呈现历史；同时，尽可能充分地体现学界研究新成果。说它俗，是因为它选择了大众语言。

不知何时起，研究者把自己关进了“象牙塔”。于是，那些研究的文字便板起了面孔。更有甚者，所思、所想、所写成了小圈子的自说自话。学者与大众之间的联系被一种无形的“文言与白话”对立起来。

这些年，大众传媒颇形热闹。清代、明代以至前朝各代的古董活跃在电视剧、电影中。不过，媒体中的历史总是与真实的历史或多或少保持着距离。盖因，不加些人为的情感戏，收视率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毕竟，现实生活压力如此之大，总不能连娱乐都那么沉重吧！

研究者和大众保持着距离，学术论文的可读性依旧很差。不过，相

当多有识之士已经觉悟，他们力图在读者与作者之间架起桥梁。我想，唐靖的写作也暗藏着如此深意。

毕竟，司马迁高标远举，给我们留下了那么精彩的文字，谁敢说他不是严肃的史论之作呢！

回到唐靖。选择大众语言只是他这本著作的一个特色。另一个特色是“回到历史现场”。书中运用了大量的文献材料，这就使史鉴的意义凸现出来。

对于学习中国近代史的人来说，民国初年这段尘封的历史似乎并不遥远。被人们唾骂的袁世凯也从未获得些许安宁。唐靖重释这一段历史，就是想整理思绪，让人们变得更理性一些。我想，他做到了。

第六章的标题尤其吸引我。曾经昭示国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共和制度一度离我们那么近，但终归于“雾里看花”。因之“抛弃共和的绝不只是袁世凯”一句就不仅仅是简单的价值判断了，它包含着对中国近代历史的深层思考。

综上，能够感受“快意读书”的恐怕就不止我一个了，我想。

拉杂写来，不过是读书人生的一种感受，谨此为序。

北师大历史学院 孙燕京

乙丑国耻日写于北京和平街袖手斋

前 言

1916年6月28日,是袁世凯的出殡之日。这位做过中华民国大总统,又硬做了数不清几天皇帝的人,生前为这个“皇帝”焦头烂额,死后还是安稳地过了一把皇帝的瘾。且不去说他规模宏大的葬地,就是其丧葬仪式就大有可观。在刘忆江的袁世凯传中看到这样的场景:人们为他的遗体起灵时用的是皇杠,棺罩所用也是皇家规制:黄缎底,绣龙纹、云水纹。新华门内用三十二人的小杠,出新华门后换八十人的大杠。送殡的路线是由怀仁堂出新华门,经天安门向南过中华门、正阳门到前门车站,路上不断有人用黄土垫地,清水喷洒。新总统黎元洪以下的文武官员在新华门处行礼,此后由京师警察总监率警察开道,陆军仪仗队一个团,海军仪仗队一个连,总计二千人组成的队列跟随其后。他们的后面是灵柩和送灵的袁氏亲属队伍,男性子孙都披麻戴孝,手执哭丧棒一根在灵柩后步行,袁的妻妾、女儿、儿媳等一千女眷则乘轿跟在后面。其后是执绋送葬的人群和官员队伍,外国使节、前清室代表送到中华门为止,国务院总理段祺瑞以下文武官员胸戴白花,臂缠黑纱,步行送灵到前门车站。在车站举行路祭之后,灵柩被抬上灵车。当日,京汉铁路客运专门停运一天,除灵车之外,路局还另外拨了两列专列,一列搭乘护卫军队、治丧人员和物品,一列运送前往彰德送葬的文武官员和知交故旧等。在京城里的整个送葬队伍计约五千人,前头的队伍已到车站,后面的大杠还在新华门前。人们不能原谅活着的袁世凯做皇帝,死了的袁世凯怎么着那就不打紧了!

看起来,这似乎应该是一个庄严肃穆的时刻。但中国的事情有时就是这么奇怪,政府眼中非常神圣的物件,在百姓看来或许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倒是作为旁观者的外国人看得清楚一些。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这样描写了为袁世凯送行时人们的反应:“没有人表现出悲伤的模样,而是表现出默不作声的冷淡。袁氏没有赢得民心,人民认为他是一个深居简出的专横的人,他同人民打交道就是向他们征税和处他们以死刑。我认为,中国人民不可能表现出西方的伟大政治领袖所受到的那种对英雄人物的热情崇拜。人民现在还没有把这样一些人看做是他们的领袖。北京的居民仍然

受着帝王的显赫以及把统治者视为半神半人而对之疏远的传统的影响,他们对于这个历史上的壮观的行列只不过是一些旁观者罢了。”^①

这就是袁世凯的最后时刻。盖棺不能定论,是历史人物评价的通例。对许多人的评价常常会经历从神变成鬼,又突然从鬼变成神的变迁。但袁世凯似乎与他们不同,他一旦变成鬼,就再也变不回来。中国真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立场,提起袁氏,都必欲唾骂而后快。陶菊隐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这样提到:“袁世凯生前死后至今的一个世纪中,是一个一直受人唾骂的人物。他出卖维新志士,资产阶级维新派骂他;他在山东镇压义和团,农民及下层劳动人民骂他;他逼宣统退位,满蒙贵族骂他,骂他是奸雄,是曹操一类的人物,要和他拼命,甚至要干掉他;他残杀国民党人,扼杀民主制度,国民党人骂他;他背叛民国,帝制自为,更遭到全国人民的痛骂;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继续骂他,认为是以他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是中国近代史上继往开来、臭名昭著的一个封建军事集团,他上继曾国藩、李鸿章等出卖国家和反人民的罪恶事业,又替蒋介石政权提供了军事独裁的可耻榜样。”^②建国前陈伯达的一本《窃国大盗袁世凯》,更将袁世凯锁定在特有一根历史耻辱柱上。袁氏的历史定位问题,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前,就这样脸谱化了。在享有盛名的历史大家笔下对他也并无好感,蒋廷黻先生就认为民国后的袁世凯没有做过一件有益的事,他说:“我们在二十世纪,所需要的,是一个认识新时代而又能领导我们向近代化那条路走的伟大领袖。袁世凯绝不是个这样的人。他不过是我国旧环境产生的一个超等的大政客。在他的任内,他借了一批大外债,用暗杀的手段除了他的大政敌宋教仁,扩充了北洋军队的势力,与日本订了民国四年的条约,最后听了一群小人的话,幻想称帝。等到他于民国五年六月六日死的时候,他没有做一件于国有益,于己有光的事情。”^③作为大陆袁世凯研究专家的侯宜杰,在其著名的《袁世凯评传》的语言叙述中,“袁世凯”这三个字的前前后后,从来就不配使用哪怕最中性的词汇,字里行间流淌着作者爱憎分明的厌恶和蔑视,诸如“袁世凯结束了浪荡公子的生活,踏入仕途,作为清政府一个极其普通的小爪牙,开始了自己的反革命生涯”^④这样风格的描写从未改变,直到全书最后一页。

落到这样的地步,袁氏也是咎由自取。但回顾袁的一生,其实他并非总是如此不

① [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的使华记》,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3~154页。

②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三联书店1983年修订版,前言。

③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插图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页。

④ 侯宜杰:《袁世凯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

堪。单就晚清最后十年中,像废除科举、举办新学、创办实业等改革措施,袁世凯都是走在最前列的人物,以“急进改革者”的面目出现于晚清暮气沉沉的官场中。在知人用人方面,袁世凯也颇具慧眼,识拔了很多被长期弃置不用的人才,比如被有人称为“中国铁路之父”的詹天佑,其之所以能完成京张铁路的修建,正是得益于袁世凯的大力举荐。在晚清宪政改革和建立新的社会管理体系方面,袁世凯掌管的直隶也走在全国前列。全国首次地方选举是1907年的天津市政选举,这是他努力推行地方自治运动的成果之一。义和团事件后,规定中国不准在天津地区驻军,袁世凯就挑选三千士兵,把他们训练成警察进驻这个地区,既维护了主权和地方治安,又让外国人无话可说,还顺便建立了中国近代的警察制度。

此后,当袁意识到宪政制度的大势所趋,就转向致力于推进清政府的宪政改革,即使满清亲王拔枪威胁也不会所动。一个日本记者对此颇为赞赏,为此还在他1909年写的袁世凯传记中作了有些过分的褒扬:

稽东西各国进化,由专制政体而趋入立宪者,其原因莫不由人民颠覆旧政府以立新政府而成之也。即或事出和平,亦由全部人民指陈利害,几经要求,几经挫折,断几许头颅,始可达其目的。若干宪法条文,岂轻易所能享受耶。若由专制国大臣而倡立宪,考世界各国改革历史,罕有其伦。袁世凯处支那专制政体之下,身为大臣,充最重要之机关,握种种之大权,而又系出汉人,竟不畏满汉之嫌,及其他各种之障害,一意为国家谋生存,为人民增幸福。首倡立宪,以一身为怨府,苦心孤诣,为开明专制之预备。首创自治期成等会,虽有东西各邦之成规可仿,要亦人所难能,虽其间用人不当,为左右所欺蒙,而袁能立入手大纲,有条不紊,为支那各行省树此先声,作模仿改良之成绩,微袁世凯曷克臻此?
.....

支那之立宪,能达其目的与否,姑不具论,惟二十世纪中,专制国断难生存于世界。由是言之,支那立宪之成不成,即前途兴亡之关系也。支那苟亡,袁世凯亦湮没无闻矣;使支那立宪果成,将来雄长东方,为地球强国,则最近世界进化史中,袁世凯三字亦必能占一特别地位矣。^①

设使此时身便死,一生真伪谁复知。少数对袁抱有同情的史学家不无感叹,假如袁的生命终结于此时,那么他的历史定论就绝不会有后来那样的坏。但这个假设注

① [日]佐藤铁治郎:《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65页。

定没有意义,袁的家族尽管有短命的基因,他也为此怀有心病,但在大起大落之后,他毕竟还要继续走下去。关于袁一生或褒或贬的评论,现在的史学界已经很深入了,如果现在还要在历史学前辈一再讲述的细节上重复,那么这本书除了浪费纸张之外,没有别的什么意义。本书试图尽量放大历史的视野,在历史的纵向与横向的比较中去对历史人物作多角度的审视。袁世凯是他所生存的社会的产物,这个社会也不可能只孕育出一个“袁世凯”,所以袁氏身死名灭之后,国还是那个国,民还是那群民,要想稍有改变还得以后数十年不断地革命、不断地改革。可见,袁世凯一生有罪固然无可否认,但第一,“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第二,只有放到具体的历史场景中,才能更好地理解袁何以会错;第三,借袁的原形,可以窥见其他很多人更真实的身影。脸谱化地把某一个人当作垃圾桶,然后将所有的污秽都倒入其中,并不能说明我们就干净。一花一世界,三藐三菩提,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经历了一段非常值得回味的历史,即使 21 世纪的今天,都不无其借鉴的意义。我们把洪宪帝制和云南护国运动放在一起谈,某种角度说,也不过只是借题发挥而已。当然,能不能达到上面所说的目的,就不是自己敢妄下断语的了。

目 录

序	孙燕京
前言	1
第一章 民初政争与国体问题再讨论	1
第一节 “窃国大盗”	1
第二节 民国首都之争	14
第三节 《临时约法》与政治危机	24
第四节 宋教仁被刺杀与“二次革命”	35
第五节 从专制走向帝制	57
第二章 半路杀出了“二十一条”	67
第一节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背景	67
第二节 袁世凯政府的应对与“二十一条”交涉	80
第三节 “二十一条”与袁世凯帝制的关系	101
第三章 帝制逼人	120
第一节 宪政专家的推波助澜	120
第二节 形形色色的劝进者	133
第三节 袁世凯的心路历程	143

第四章 轮到了梁启超与蔡锷	158
第一节 戊戌变法梁袁历史过节的澄清	158
第二节 与袁共舞的良苦用心	176
第五章 护国倒袁,功落谁家	192
第一节 议论纷纷的护国首功问题	192
第二节 北洋系统的内部抵制	204
第三节 不可忽略日本的作用	212
第六章 帝制易倒,共和难为	222
第一节 吾民吾土	223
第二节 抛弃共和的绝不只是袁世凯	232
第三节 孤独的思想者	246
参考书目	254
后 记	261

第一章 民初政争与国体问题再讨论

民国初年的政治斗争，其是非异常复杂，并直接导致新生的中华民国走入歧途。我们探讨袁世凯的洪宪帝制，不选择从1915年帝制初露端倪的时候开始，而是将视野进一步放大，退后到清末民初的交接时代，在民国建立的大背景中体会民初政治的繁难。这或许更有助于我们全面地看清亦新亦旧的袁世凯背弃民国、回归传统帝制的原委。

第一节 “窃国大盗”？

时人论及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往往习惯用“窃取”一词。但假如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民国成立前后各界的反应，就不能不承认一个简单的事实，即袁的总统位置，至少就当时的场景来说，可谓名至而实归。

一、“非袁莫属”的政治呼声

袁世凯在武昌起义后短短半年的时间里，由一个赋闲在家的闲散人员，一变而为清王朝的内阁总理，再变而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加上袁世凯一贯的阴谋权诈，使人们很容易认定为是袁通过种种阴险的手段，从孙中山手中篡夺了革命果实。这种定性经陈伯达一本书的传播，而使“窃国大盗”四字不胫而走，几乎达到盖棺论定的效果。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这个结论太简单了一些，也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南北议和，是辛亥革命的重要转折。议和的结局是清帝退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和平谈判实现政权更迭的重大事件。清帝退位后，孙中山辞职，南京参议院依法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只是兑现政治承诺而已。于孙无所谓让，于袁无所谓夺。”^①我们简单从袁世凯出任清廷内阁总理的过程，即可一窥其貌。

1911年清王朝在内外打击下风雨飘摇，朝臣中起用袁世凯的论调日益高涨。清

^① 范福潮：《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前的南北博弈》，《南方周末》2008年09月25日，D23版。

廷第一任内阁总理奕劻与协理徐世昌、那桐于9月联合上奏,称袁世凯“其才胜臣等十倍,若蒙特予起用,必可宏济艰难。”^①主动辞职,希望让袁氏出山掌政。武昌起义后,更多的人要求“启用袁世凯统兵平乱”。清廷也从10月14日到26日连续发出七道谕旨,一边催促袁出山,一边给袁的职务也节节升高,从湖广总督,再到钦差大臣,最后才终于任命为一人之下的内阁总理大臣。这年九月十一日(1911年11月1日),正值清军与民军激战于汉口,袁世凯也赶到湖北督师,清廷上谕电达前线:“袁世凯现授内阁总理大臣,所有派赴湖北陆海各军及长江水师仍归袁世凯节制调遣。”同日,奕劻、那桐、徐世昌总协理大臣及载泽、载洵、傅伦、善耆等亲贵大臣均上奏辞职。袁世凯取得了足以控制朝政和指挥军队的权力,立即派人南下与黎元洪接洽,表达“和平了结”之意。在几经往复之后,黎元洪回信袁世凯:“公果能来归乎?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②九月十九日,身在汉阳前线任民军总司令的黄兴也致函袁世凯,对袁寄予厚望:“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③黎元洪还一方面通电相继独立的各省,各派全权委员赴武昌组织临时政府;另一方面劝袁世凯倒戈北伐,克复京师:“以项城之威望,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

为此,袁世凯11月30日再派密使刘承恩、蔡廷干过江,与黎元洪谈判。独立各省的代表此时也由上海来到武汉。为使黎元洪能全权代表各省,有与袁世凯谈判的对等地位,各省代表会议当日议决:以鄂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请黎元洪以大都督名义,执行南方独立省份的中央政务。谈判双方很快达成停战协议,并经随后的五次协议而将停战期一直延续到1912年1月29日。有了这个缓冲期,南北正式谈判开始。袁世凯委任唐绍仪为议和全权代表,南下议和。黎元洪提名伍廷芳为民国议和全权代表,并主张谈判在武昌举行,借以主导议和进程,维护湖北的革命中心地位。但在南京被革命军占领后,在同盟会的影响下,各省代表议决“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六),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25页。

② 张国淦:《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4期;并见《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279页。

③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1-82页;并见《黄兴致袁世凯书》,《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

并把议和地点改在了南京。南方议和全权代表伍廷芳也受张謇、赵凤昌等人劝阻,不愿到武昌,改往上海谈判。于是,袁世凯电令唐绍仪“赴沪讨论”。在汉口参加各省代表会议的江苏代表雷奋说:“当时协议之条件有三:(一)双方即日停战;(二)清廷宣布退位;(三)选举项城为大总统。……各代表讨论之结果,并征求黎元洪、黄兴、程德全之意见,均可行。”^①

伍廷芳、唐绍仪即围绕召集国民会议的办法,会议地点及开会时间等问题展开谈判。但伍、唐却仅仅只是“代表”,幕后操纵者却是江浙立宪派领袖张謇、赵凤昌和袁世凯,而他们在议和的关键问题上早有默契了。张謇与袁世凯的交情可追溯到二十多年前的朝鲜时期。武昌起义前的1911年6月7日,张謇从汉口赴京途中就特意在河南彰德下车,拜会罢官的袁世凯,对时局的变化交换了意见。袁向张承诺:“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也就是说,遵从您的意旨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须在各方面,把我的诚意告诉他们,并且要求您同我合作。”^②武昌起义后,袁世凯果然信守诺言,派唐绍仪到南方议和前嘱咐其到上海后必须先与张謇见面。而唐绍仪一到上海,也立刻面见张謇,请示机宜。张謇为此感叹“不枉老夫此行也”!武昌起义后,张謇与袁世凯一南一北,函电交驰,袁视张为东南巨擘,张倚袁为中流砥柱。张謇虽然被南京临时政府任命为实业总长,但却极力鼓吹非袁莫属。

不独张謇作如此感叹,其他前清时期的立宪派、改良派大都选择了联袁的策略。严复、梁启超等人的活动即为明证。严复与袁世凯的关系同样颇有渊源,虽然在戊戌变法后二人曾经中断了交往,但严复内心是看重袁的。当袁在1909年初被清廷罢职时,墙倒众人推,严复却公开说:“世凯之才,一时无两”,“此人国之栋梁,奈何置之闲散”。^③武昌起义后,严复积极为袁世凯奔走宣传,他认为:“居今之日,平情而论,于新旧两派之中,求当元首之任,而胜项城者,谁乎?”^④严复对袁的支持是与对革命党的反对相表里的。二次革命中,孙中山和国民党一众人等群情激奋,而严复却说“大总统诚不得已而用兵”,而革命党“不察事势,过尔破坏”。后又说:“顾三年以来,国民党势如园中牵牛,缠树弥墙,滋蔓遍地,一旦芟夷,全体遂呈荒象,共和政体名存而已。以愚见言,即此是政界奇险。但愿大总统福寿康宁,则吾侪小人之幸福耳。”^⑤对袁的倚重溢于言表。

①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82~283页。

② 刘厚生:《张謇传记》,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81~182页。

③ 陶菊隐:《筹安会“六君子”传》,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5页。

④ 王棫:《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24页。

⑤ 王棫:《严复集》第三册,第613页。

梁启超与袁世凯因戊戌变法中袁世凯的告密而怀有深仇大恨,二人几乎完全无合作的可能。但结束流亡生涯回国之始,即一反常态,尽心拥袁,不惜与孙、黄革命党撕破脸皮(梁的态度与苦衷,我们在后面还会谈到,此处暂略)。

之所以形成这种“非袁莫属”的局面,一当然在于袁世凯近二十年来在晚清政治中所表现出的才干,二则因为袁掌握的实力。在君主与共和交替的时期,袁世凯无论倒向哪一边,胜利的天平就会偏向哪一边。武昌首义取得暂时胜利后,革命党人胡石庵编辑《大汉报》,鼓吹革命,信心十足。但当他得知袁世凯已接受清廷任命准备起身南下时,心中大忧,认为“袁果亲来,吾军万非其敌,大势去矣。”这一点孙中山同样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无论心中多么不愿意,但都要表态自己担任南京临时政府的临时大总统,不过是“暂时承乏”,“虚位待袁”。^①而革命党第二号人物的黄兴也为避免袁世凯“像曾国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一样来搞垮革命”,建议“给他一个民选的总统”,^②因而对袁宣称:“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逢,祈毋坐失”。^③这样的言论,后人读来或许会觉得有些过分,有些言不由衷,但类似的拥袁语言却绝非出自一两人之口,而是一种潮流。

如果再对比一下南北双方的军事力量,对袁世凯此时举足轻重的地位或许能有更深的体会。首先,从兵力上来看,双方差异悬殊。当时革命军的主力是反正新军,即使宣布独立的各省新军全部反正,其兵力共计六镇十二协三标,约 88539 人。虽然也有会党武装及新募之兵作为辅助,但没有准确数字。清军兵力包括新军八镇八协一标,约为 129123 人,为革命新军的 144%。再加上其他如旧巡防营、新募巡防营、八旗兵、绿营兵等,清军总计约 80 万人,为革命军数倍以上。^④这个数字或许有些夸大,但双方差距仍然是明显的。其次,双方装备差异也很大。革命新军一般装备 88 式毛瑟枪和“汉阳造”,机关枪较少,火炮较为落后。会党武器装备更差。清军北洋六镇,由中央拨款训练,装备水平一直处于全国之最,不仅广泛地装备了德国 98 式步枪,而且配备了相当数量的马克辛重机枪与麦德森轻机枪。火炮也较为先进。武汉保卫战,革命军失利的重要原因便是清军拥有机枪与子母弹。^⑤最后,从双方组织和军事纪律

①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 4 册,中华书局 1960 年版,第 1018 页。

② 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 1 集,文史资料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200 页。

③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82 页。

④ 张玉田等编:《中国近代军事史》,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41~445 页。

⑤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 140~145 页。

来看,也大不一样。革命军队虽然精神可嘉,但绝大部分是会党乃至绿林队伍改编而成;虽然人数不少,但武器装备、训练、指挥和纪律等都远逊于对方。将帅临时选派,滥竽充数,鱼龙混杂;武昌老兵仅存数千,以至能托枪预备放者,全数提为班长。新兵虽多有“牺牲精神”,但夜间“即潜回其家”,战场上“群往争食”等现象屡禁不止。前线指挥不灵,“黄总司令命令停止(后退)皆不听命”。^①而北洋六镇的军官多系正规武备学堂毕业,士兵也基本上经过严格的训练。当时任总统府秘书长、协助孙中山综理全局的胡汉民也承认:“南京军队隶编于陆军部者,号称十七师,然惟粤、浙两军有战斗力。粤军不满万人……浙军将军,则素反对克强,不受命令……其他各部,乃俱不啻乌合,不能应敌。”^②

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大城市的主要报纸都涌现出宣扬“非袁莫属”的拥袁呼声就毫不奇怪了。况且大乱之后人心思定,人们太需要一个能被各方接受的、能结束“每逢夜半,枪声四起,睡不安枕,惊惶起坐”动荡局势的强人,而这个人显然当时非袁世凯莫属。

相比之下,袁世凯却显得行动迟缓,先称“足疾未愈”拒绝出山,筹码升级之后才姗姗而出。人们都相信这不过是袁待价而沽、讨价还价的权谋。但细推时势,则似乎也并不尽然,袁“颇为踌躇不能自决”怕也是其中的原因。有人记载袁出山前“昼夜环室中,状类发狂,每阅一电,时而喜,时而怒,时而忧,虽家人莫测其意”。^③一个外国观察者也说:“袁世凯的日子很不好过。他累死了。他患严重的失眠症,就职以来益形苍老。他所显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不能不令人钦佩”。^④

袁世凯是识时务的聪明人,也知道废君主、倡共和已经是大趋势。但一则袁做了满清几十年的老臣,传统君臣思想毕竟根深蒂固,要在他的手里推翻清王朝,在道德上难免有相当的顾虑;再则如何顺利地迫使清廷迅速地交出政权,其实也是袁世凯所面临的棘手问题,“民主共和”并不如后人想象的那样唾手而得。且不说保皇的宗社党人一直宣称要以性命相争,甚至已将炸弹埋到了袁世凯的家门口,对其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就是他最亲信的部下如冯国璋等,一旦涉及“背叛朝廷”这样的事,能不

①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165~166页。

② 胡汉民:《胡汉民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9页;并见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史资料》总45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9页。

③ 野史氏编:《袁世凯轶事续录》,上海文艺编译社1916年版,第34~35页。

④ [澳]骆惠敏:《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824页。

能靠得住都大成问题。单从传统道德上说,如何给清王室一个交代,给部下一个交代,其实也是给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一个交代。为了摆平保皇势力,袁是很费了些心思的。一位作者对此评论说:“在上台的过程中袁世凯没有窃,他是要了一些政治手段,但这些手段于政治家而言乃职业手段,属政治策略范畴,谈不上是阴谋诡计。”^①

张国淦的一段回忆从某种角度说明袁的心结被如何打开:

袁到京,主张拥护君主,绝口不言共和,至各处通电到京,则言“本人地位但知拥护君主到底,绝对不能赞成共和,不过世界既有共和学说,亦不妨研究。”此时汪兆铭已经开释,乃约汪到锡拉胡同谈论,汪每晚饭后七、八时谒袁;十一、二时辞出,初只言共和学理,谈至三夜,渐及事实,汪言:“如须继续谈去,请求再约一人。”袁问何人,汪以魏宸组相对,袁许可。次夜汪魏同谒袁,于是讨论中国于君主共和何者适宜,魏善于词令,每以甘言饵之,袁初尚搭君主官话,连谈数夜,袁渐渐不坚持君主,最后不言君主,但言中国办到共和颇不易,汪魏言:“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袁初谦让,后亦半推半就矣。^②

袁世凯并非顽固不化,也不完全迷信手中的武力,他还是试图去顺应历史前进的方向。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说:“然而彼众若狂,醉心民主,兵力所能平定者土地,所不能平定者人心,人心涣散,如决江河,已莫能御,爵禄不足以怀,刀兵莫知所畏。似此亿万之所趋,岂一二革命党所能煽惑。”^③但正当袁踌躇之际,孙中山返国,抢先当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二、孙中山抢先临时大总统

武昌起义后,南方独立各省迅速形成了两个政治中心,一个是黎元洪的武汉,另一个是同盟会的南京,但在暗中操纵政治局势的却是江浙士绅为核心的立宪派。南北议和就是在他们的影响下进行的。会谈的地点选在上海,既摆脱了黎元洪的控制,也摆脱了同盟会的控制。不过总体上说,黎还是倾向于立宪派,反对同盟会的。独立各省的领导权大多不在同盟会手中,从同盟会中独立出来的光复会也大有控制江浙两省的趋势。一旦清帝退位,袁世凯当选大总统,同盟会将无以自处。虽然为了扭转被动局面,同盟会也加强了攻势,由陈其美策动各省代表会议的留沪代表,选举黄

^① 张代春:《也谈孙中山让位与袁世凯上台问题》,《史学月刊》2006年第10期,第124~126页。

^②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115页。

^③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74页。